

「近代東亞城市的社會群體與社會網絡」國際學術討論會會議報導

李鐙光 國史館助修

本次研討會是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日本大阪市立大學都市研究中心合辦，2012年7月24至25日舉行，計分8場，共發表21篇論文，以下依大會議程順序簡介各篇論文要旨如下：

會議開始由葉文心發表主題演講，她由Max Weber與William Skinner對中國是否出現過現代意義的城市談起，進而指出過去研究城市史有系統性與網絡性兩種入手方式，系統性強調城市邊界，而網絡性重視城市功能。要綜合兩種方式，則必須進一步深究不同歷史背景下城市空間的歷史型態，以及必須注意從非文字史料中尋求各種人、事、地、物對城市的影響。

仁木宏以16世紀日本都市特徵為題，大部分的都市具有町—惣挺的二重構造，不同的町之間有許多的「構」做為分界，町具有很高的向心力，不同的町之間常因瑣事而引起武裝戰鬥。張寧以跑馬總會來探討英式賽馬網絡，指出賽馬活動包裝許多網絡，從蒙古到香港都有馬匹貿易，而不論是華人或洋人，都有藉賽馬來擴大自身的社會網絡，英式賽馬成為跨國籍與國境擴展社會網絡的利器。朱瑪瓏則以1880年代上海與香港如何建立沿岸氣象學做為切入點，上海的中國沿岸氣象服務與香港天文台，都想成為當時中國的「中央氣象台」，而兩地的運輸業者，也利用各地出版的報紙，相互轉載氣象消息，推動輿論，以利氣象儀器觀測天象，並持續比較兩地所提供的氣象服務。

塩卓悟比較北宋開封與南宋臨安兩座城市的食魚文化，他指出開封雖然位於華北，過去往往被認為食魚文化不發達，但宋代的食魚文化實紮根於此。開封的魚主要來自黃河流域與山東半島，臨安的魚主要來自浙東地區的海水魚與淡水鹹魚。臨安與開封相比，與食魚文化相關的行業取得飛躍性的發展，相關的業者都在便於集中與販賣的地區，形成更顯著的食魚文化與消費網絡。賴毓芝則以 1880 年代為什麼有大量日本圖書流入中國作為問題的核心，她認為大量日本出版品流入中國，出於商業的目的，大量的石版畫與銅版畫由上海輸入，石版畫與銅版畫不全然是競爭的關係，此二者主要的對手是中國傳統的木版畫。新輸入的日本書籍在報紙廣告的協助下，特別是附有圖畫的書及繪本。另外大量有圖畫（象）的書，也反映出對視覺文化的渴望。

賴惠敏使用中研院近史所、故宮博物院、南京一檔館的相關史料，來討論清末庫倫的山西人的商業活動，庫倫商號多為張家口、歸化城商號的分號，晉商集中在張家口的上堡，出口貨物與茶葉為主，進口貨物以毛皮和呢絨為多，貿易額最高時曾到達 1,500 萬盧布。另外，蒙古地區的農牧墾殖與木材貿易，也在 1880 年代後興盛起來，山西商號向蒙古人租地，一方面有增租的威脅，另外方面也有官方需索的困擾。田宓以歸化城為例，探討清代的邊疆秩序，從清初做為喀爾喀與厄魯特朝貢的主要通道，就已

彰顯其重要性。經歷過康雍乾三朝西征後，清廷鼓勵前往新疆、蒙古經商，歸化城商人積極參與其中；西北回亂之時，歸化城是重要軍餉的轉輸地，該地承擔部分軍餉匯兌功能，到了清末，歸化城商人在俄國商人不斷地進逼下，甚至出現華商依附以求避稅的情形。楊煜達指出，清代雲南礦業的發展處於傳統中國的頂端，不論是投資開採的硃戶、冶煉的爐戶和運銷商身分彼此常相互重疊，但是股份制在其中發揮主要作用，而且技術專案也可以分配冶煉的成品，而隨著礦業規模的擴大，礦業城市中相關行業的會館與公所扮演的角色也越來越重要。

塚田孝以近代大阪所存在的貧困階層——乞食者、窮人為主角，當時這群人被稱為「非人」，作者利用 1698 年碩果僅存的一份關於此種群體的戶口資料進行研究。從戶口資料來看，貧困者本人的家庭是從外地到大阪來的，兒子的妻子也來自外地，但是孫子的妻子則又變成多為本出身的貧戶，在這樣的情形下，貧戶之間的集團化也越來越明顯。川野英二教授的論文則將視角轉至現代大阪，透過調查資料表明，大阪人將貧困原因歸因於個人責任，也可以從中發現都市中的貧困層所居住的地區有明顯的集中性。還有貧戶地區的失竊率比較高，而且這些貧戶人除了已婚者外，經歷過身體、暴力的認知也比較高。

劉海岩研究的是民國初年在天津「寓公」群體，這個群體包括失勢的軍閥，在野

的官僚及滿清的貴族。這群人有派系、同僚、君臣、同鄉等等關係，這群人得勢時便在北京呼風喚雨，聚斂財富；在失勢時則在天津等待機會，生活極盡奢華。王標以李慈銘的縵越堂日記為中心，探討李氏的同族、同年、同鄉關係。李氏對於族人的往來集中與許多應酬，而李氏中進士時年紀稍長，因此與諸同年中舉者並不親近。而同為紹興同鄉者中，有許多人是出身寒微的俗吏，士大夫亦不願與之為伍，顯然士大夫認同優於同鄉認同。但通觀李氏日記，同鄉關係仍然很重要，在其交遊的人士中仍有許多同鄉者。

郭美芬則從澳洲的都市化對華裔商會的關係入手，1880年以後大批華人移民澳洲，直到20世紀初期總數有3萬餘人。白澳政策與都市化影響了華裔移民的社會網絡與結社習慣，華裔移民多組成貿易商與蔬果交易商，以公開的規章與選舉方式，藉此互通商機宣傳商戰。伊地知紀子以在日本的韓國濟州島人為例，說明此群體特別注重同鄉關係，他們脫離農村（濟州島）而到大城市（大阪），出現群居的擬制村現象，彼此在生活上互相幫助，村中有人過世也大多回到故鄉安葬。張志雲從海關內部的人事制度改革，重新思考此次是否真的帶來華洋平等。他認為改革實際上將洋人津貼制度化，更確立華洋之間的不平等，而中下級的華人職員亦非改革的支持者，因為改革使其升遷機會變少，因此必須重新思考反帝國主義與海關改革的關係。

平田茂樹以宋代科舉網絡為題，說明科舉本身就存在許多網絡，支持士子參加科舉。士人通過科舉取得新的資格，也創造更多網絡。在政治生涯中薦舉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必須不斷獲得高官的推薦。孫慧敏以朱家驊擔任浙江省長時，向其求職者的信函為材料，她指出在僧多粥少的情況下，朱氏通常以「存記」的方式來答覆求職者，雖然是說將該員列入候補名單，但實際上已無缺額。推薦信的盛行雖不代表朱氏不重視求職者之資歷，但仍不免令政府公信力打了折扣。李鎧光以1946年戰後上海市參議員為分析對象，試圖討論其所形成的內外網絡，論證由參議會內部的審查委員會中，參議員大多選擇與學經歷相關的委員會。另外，參議員也都具有各式各樣的身分，便於與不同階層的人聯繫，以形成不同的外部網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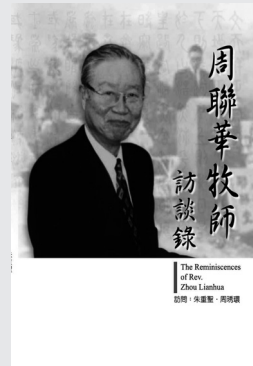
野崎充彥的論文旨在討論15世紀朝鮮的宗教文化，朝鮮王朝的宗教政策是「抑佛崇儒」，在儒教中，被視為歷代始祖的檀君因為統治的正當性被強化，佛教則因受抑佛政策的影響，造成佛寺遠離城市居於深山。道教雖被視為異端，但未禁止，仍有流行於民間的盲僧舉行宗教儀式，在風水上，在近代以來形勢派與理氣派的對立一直存在。林志宏利用1930年代兩次對北京城市調查資料：《舊都文物志》與《北京志略》，研究指出兩部書的作者未必全部出身北京，也不一定清楚的政治傾向與立場，必須要小心檢視這些書的作者，倒是《舊都文物志》，

有國民政府想要強化國家民族凝聚力的意涵。而成書於日本控制下的《北京志略》則以寓國防於市政的觀念，欲將北京描繪成興亞基地。雷祥麟則以麻黃與常山為個案，探討因兩種中藥所形成的科技物的社會技術網絡。雷氏指出，這兩個中藥應用成效最大的成功案件，並不符合學界所認定的科學實驗程序，而是建立一系列巧合之上。透過這兩個案例，我們應進一步反思對於中藥的信任與善用在現代東亞，為什麼非常困難，以及要建立個「跨越現代性斷裂」的研究，究竟需要克服哪些困難。

在綜合討論時，井上徹以吉田照之將城市分為傳統、近代、現代城市三類，而按照吉田氏之三分法，值得進一步傳統城市的類型及其與社會的關係，而近代與現代城市又如何面對現代化的衝擊，葉文心則回應在以理論及意識型態主導城市史研究，實證研究的重要性必須加以重視。進步不一定代表更好，傳統也未必沒有價值，傳統有時亦是促成進步的動力。

本次學術討論會的特點，是時間的跨度大，討論的地域廣，從北宋到現代，從臨安、上海、蒙古、朝鮮、大阪，可說是有時間上的縱橫，與地區的概括。特別是韓國與日本城市的發展，是臺灣學界較少觸及的。在沒有評論人的情形下，各場次都能見到與會學者的討論，激盪出不少火花，希望此類的學術討論會能成為常態化，創造出城市史研究者間互相交流的平台。

出版資訊



周聯華牧師訪談錄

口述：周聯華牧師
訪問：朱重聖、周琇環
2012年12月初版
精裝 240元

本書由周聯華牧師口述、國史館訪問整編而成。全書分為：生平簡介、宣教與事奉、神學教育與神學觀點、見證臺灣基督教的成長、相關人物與資料等五章，由基督教史的角度，闡述周牧師的一生經歷及思想。

訂購詳見「國史館出版品銷售處」
(頁 246)